

第三章

运动、民族主义和法国大革命

英国人，将向前，带着无上的勇气和高贵的心；不必刀枪剑戟，胜败只凭拳头！

皮尔斯·伊根，1824年

1814年6月，英国最杰出的拳击手聚集在劳瑟勋爵在伦敦的住所。劳瑟勋爵是保守党政治家，未来的朗斯达尔伯爵，英国拳击金腰带上至今仍刻着他的名字。当晚，汤姆·克里布（Tom Cribb）、约翰·杰克逊（John Jackson）、汤姆·贝尔彻（Tom Belcher）、比尔·里士满（Bill Richmond）等拳手贡献了最星光璀璨的拳击展览。观战的有沙皇亚历山大一世（Tsar Alexander I）、普拉托夫将军（General Platov）和布吕歇尔元帅（Marshal Blucher）、普鲁士腓特烈·威廉三世（Fredrick William III）和数位英国王子。他们正在去往维也纳会议的路上，由于法国拿破仑战败，他们将在会上重新划分欧洲。这次活动就是为了庆祝这些大国的胜利。一周前，克里布被介绍给普鲁士陆军元帅布吕歇尔。听说克里布是英格兰冠军，布吕歇尔回答：“那么克里布也一定是元帅！”第一次，运动、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以公开的政治性的方式，联系在了一起。

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期间的英法战争，将体育和英国民族主义永久性地联系起来，而劳瑟的拳击展览象征着这种联系的达成。法国革命使公平成为英国运动的核心概念，但这不是法国革命及其余震对运动唯一的影响。在法国革命的影

响下，英国运动及其文化涵义有了根本性的转折。从此，运动和民族主义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

民族主义和体育文化的交织缠绕不止存在于英国。在德国，出于被拿破仑军队占领的羞辱，民族主义者发起了体育协会这一民族主义活动。德国从18世纪末起开始教授体育课，其主要的支持者顾兹姆斯（J. C. F. GutsMuths）在1793年出版了《青年体育》。1811年，柏林教师费里德里希·路德维希·杨（Friedrich Ludwig Jahn）开办了一家露天体育馆，将体育运动和民族主义政治结合在一起。该做法在德国广为传播，各地都开办了体育协会（Turner）。很多协会会员参加对法国的战斗，杨本人也参与了民团。

杨支持德国统一和民主宪法，但并不激进。1810年他写道：“波兰人、法国人、神父、贵族和犹太人是德国的不幸。”1817年，在杨的鼓励下，德国民族主义学生组织了瓦特堡游行，抗议维也纳会议未能裁断德国统一。在抗议活动中，学生烧毁了反德书籍和象征法国占领的物品。和英国人一样，德国民族主义者将德国的运动和体育协会组织带到了他们所去的世界各地。

没有什么比国耻更能促进体育运动。也是因此，瑞典成立了瑞典体育协会。在拿破仑与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签订《提尔西特和约》（*Treaty of Tilsit*）后，俄罗斯在1808年进攻瑞典，割占了芬兰。和德国一样，瑞典兴起了民族主义运动，意图重树民族自豪、重建瑞典文化。民俗学者和诗人佩尔·亨里克·林格（Per Henrik Ling）在瑞典担当着和杨类似的角色。

色，他开发了一套教育和军事目的的体育系统，1813年他被任命为皇家中央体育学院的第一任负责人。在1814年《基尔条约》（*Treaty Kiel*）后，瑞典不再是欧洲的军事威胁。因此，瑞典的体育教育失去了军事意义，在19世纪后期在英语国家大行其道。

在捷克，紧随着1848年革命的失败，国家独立运动也失败了，这导致了捷克索科尔（鹰）体育运动的兴起。索科尔组织由米洛斯拉夫·蒂尔（Miroslav Tyrš）于1862年发起，受到德国体育协会的影响，索科尔也是民族主义组织，谋求使捷克脱离奥匈帝国独立。这个组织非常军事化，成员穿着制服、参与军事训练。由于捷克民族主义的亲斯拉夫的历史渊源，索科尔发展成为泛斯拉夫的运动，在斯洛文尼亚（1868）、克罗地亚（1847）和塞尔维亚（1891）都成立了组织。索科尔在沙皇俄国也开始流行，尤其在1905年俄罗斯不光彩地输给了日本之后。这个事例也展示了军事失利和体育之间的关系。

在18世纪上半叶英国的体育运动中，爱国主义从未缺席。在1744年，杰克·布劳顿颇有些夸张地说：“经验告诉我们，在英国人的拳头下，外国人颤抖得比在火枪下还厉害。”然而当时运动在英国文化生活中的地位相对较低，因此这种说法也不过是一个狡猾的商人的修辞。但是在18世纪的最后二十年，战争使得运动和英国的民族性密不可分。琳达·科利（Linda Colley）发现，在拿破仑战争期间，打猎俱乐部开始穿着“仿

照军装”的制服。1805年，威廉·科贝特（William Cobbett）表示运动对赢得英法战争很重要：

不只是拳击，摔跤、铁头木棒、单棍、斗公牛等各种大众的运动，都有使人残疾甚至丧命的危险。但同时，这些运动也让人们勇于进行更高层次的活动。这些活动以及活动中自然产生的人格和结果，帮助我们维护了祖国的自由独立。

尤其是拳击，人们认为它造成了英法两国国民性的差异。皮尔斯·伊根解释说：“英国人，将向前，带着无上的勇气和高贵的心；不必刀枪剑戟，胜败只凭拳头！”相对地，欧洲大陆更喜欢用刀剑和决斗来解决问题。威廉·温德姆在担任皮特的战时秘书期间，曾经支持旺代省的反大革命行为和波旁王朝的复辟。1809年，在比尔·里士满通过52轮打败乔治·马多克斯后不久，威廉·温德姆表示，拳击是英国人战斗精神的精髓：

为什么我们如此推崇士兵们天生的勇猛，就像在塔拉韦拉、维莫拉和梅达所展现的勇猛，但是却不鼓励会激发这种勇猛的日常做法和习惯呢？拳击赛场观众席上的三千名观众，他们的想法和勇士们在战场上的想法是一样的。……大众平和、愉悦而柔弱，或是崇拜勇猛坚韧，这难道没有区别吗？

幻想俱乐部的祝酒歌里也有对拳击和英法战争关系的类似叙述。幻想俱乐部是贵族的非正式组织，为伦敦运动界提供资金并赋予社会名望。1811年，汤姆·克里布战胜了汤姆·莫利诺克斯，当时为之庆祝的一首十二节长歌里这样唱道：

斟满你的酒杯，先生，请接受我的祝愿！

当敌人踏上海岸，我们已准备妥当。

勇敢的巴克利走在前面，接受美丽的女士的崇拜。

无论是魔鬼还是拿破仑，就让我们来打败！

（注：巴克利是一名徒步运动员，曾是克里布的教练。）

英法战争不仅是兵器相交，还是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较量。英国反对法国大革命所提出的主张，无论拿破仑是否支持这些主张。欧洲的统治阶级十分恐惧，害怕国内的穷人也效法法国的穷人，站起来反抗主人。因此，他们的敌人不止在国外，也可能以普通英国人的形式潜藏在国内。激进的辉格党议员理查德·佩恩·奈特（Richard Payne Knight）曾在1806年著文支持拳击运动：“如果不能偶尔为奖金和荣誉勋章打打架，那么底层人民将会变成懦夫和暗杀者的乌合之众。为了金钱或国外暴君的野心，他们随时随刻都会牺牲上流社会。”

1804年，体育杂志表示，体育可以替代“革命主义这一迷人的谬误”。一位幻想俱乐部成员在皮尔斯·伊根的《黑森

林拳击》(*Boxiana in Blackwood*) 杂志中, 著文称赞在曼彻斯特圣彼得运动场杀戮了十五名非武装示威者的彼得卢屠杀:

8月16日, 曼彻斯特的地方官尽到了他们的职责。愿拳击繁荣, 而激进主义消退。……没有什么比一群看拳击赛的英国人更高兴。没有煽动性的标语、没有演说家、没有需要大陪审团事后干涉的事况——一切由裁判裁决。

因此, 特里维廉 (G. M. Trevelyan) 在《英国社会史》(*English Social History*, 1942) 一书中的观点并不算原创: “如果法国贵族能和农民一起打板球, 他们的城堡不会被烧毁。” 体育技术的实用知识, 也能够帮助受到被埃德蒙德·伯克 (Edmund Burke) 称为“卑鄙的大众”所冒犯的英国人。在 1799 年出版的拳击技术手册《徒手防御之术》一书中, 作者悲叹: “下层人的粗鲁, 早已是这个国家的大憾。” “抑制邪恶的唯一办法, 就是个人惩恶。” 之后, 作者简要说明了如何以拳头发难。

运动的意义在意识形态层面进一步放大, 超越了日常政治层面。运动和英国的民族认同与民族性进一步交织, 运动的倡导者因此认为英国和运动的关系更深刻、更基本。1788 年《完全拳击术》(*The Complete Art of Boxing*) 的匿名作者毫无根据地表示: “在阿尔弗雷德大帝的时代, 英勇的军事训练中就有拳击和摔跤。” 与法国的冲突, 让英国人更迷信运动是英国独有的, 也对半虚拟的农村英格兰生活 (风景往往是英格兰, 即典型的英国风景) 更加充满怀旧之情。这种倾向在

华兹华斯的笔下最为清楚，也最为优美。在 1802 年《在多佛附近山谷，靠岸之日作》一诗中，他描写了自己从欧洲大陆回到英国的宽慰之情：

在祖国的土地上，再一次呼吸，
雄鸡啼叫、炊烟袅升、钟声鸣响。
远处的草地上，是
白衬衣的男孩们在嬉闹……

白衬衣的男孩代表板球，象征着一个永恒不变的田园式国家，和充满骚乱与斗争的欧洲截然不同。华兹华斯所描绘的是一种“可爱的英格兰”，是田园诗一般的恭敬的社会和谐。到 18 世纪末，经济和社会变化加速了，怀旧和对旧时的田园幻想国的向往非常流行。比如，射箭的复兴。1781 年，阿什顿·利弗爵士（Sir Ashton Lever）成立了射箭协会。这个协会在上流社会深受欢迎，一大原因就是它采用了中世纪的标志和习惯。同样的原因造就了一些书籍的流行，比如约瑟夫·斯特拉特（Joseph Strutt）在 1801 年出版的《英格兰人的体育和娱乐》（*The Sports and Pastimes of the People of England*）。该书宣称要探明运动在英国的历史传承，然而却很少提及板球、完全没有探讨拳击。皮尔斯·伊根的成功不只是因为他拙劣的散文，更是因为他将运动置于历史背景下进行叙述。伊根最有名的作品是《拳击赛》（1813），该书一方面是他对拳击历史的详细讲述，另一方面是他对拳

击的英式特征的思考。公平竞争是英国特有的概念，可以回溯到 19 世纪 20 年代的文书中。在沃尔特·斯科特爵士（Sir Walter Scott）的历史演义小说《劫后英雄传》（*Ivanhoe*, 1820）和《尼格尔的家产》（*The Fortunes of Nigel*, 1822）、黑兹利特（Hazlitt）1825 年的散文《可爱的英格兰》（*Merry England*）中，都可以找到“公平竞争和老英格兰万岁”的句子。在《可爱的英格兰》一文中，将滑铁卢的胜利归功于由拳击而习得的“英格兰的勇气和男性气概”。

以运动为载体虚造和改造传统的做法，曾不断发生，尤其是在运动或国家感觉受到威胁的时候。最极端的例子大概是威廉·韦伯·艾利斯和阿布纳·道布尔迪的神化。他们在橄榄球和棒球推广和发展时，几乎不知道这两项运动，死后却分别被指定为橄榄球和棒球的创始人。19 世纪 90 年代，皮埃尔·德·顾拜旦（Pierre de Coubertin）重塑奥林匹克运动会时，也是根据希腊奥林匹克虚构了业余主义原则。在 19 世纪 30 年代，由于职业球员的势力提升、源自农村的板球传统衰落，板球也开始重新设计其历史。约翰·奈伦的《我所在时代的板球队员》（*The Cricketers of My Time*, 1832）一书，讲述了汉博尔顿板球俱乐部的故事，该俱乐部是 18 世纪 70 年代至 80 年代英国板球的权威组织。在这个田园故事中，“位高则任重”的贵族和顺从而骄傲的工匠，因为对板球的爱而站在了一起。这个故事为后续的板球写作奠定了基调，也是其他运动写作的基调。因此，在法国入侵和国内革命的威胁

过去后，18世纪90年代到19世纪20年代间出现的体育的文化涵义依然保留着。运动普遍而长期存在，因此代表着一种“常识”和日常的世界观。运动是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运动是社会的缩影，它将自己视为一个市场，在其中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赢家或输家。此外，运动也是一个非常男性化的世界。讨论足球成为一种“深刻的政治”，通过貌似非政治化的方法表达政治观点，其不言而喻的假设自然是传统而非批判性的。运动并不在政治生活之外，相反地，运动与政治的交织太过普遍，结果其中的政治反而显得无形。